

蘇聯在印度洋的海軍實力政策

李 文 政

前 言

美國海軍之父馬漢 (A. T. Mahan 1840-1914) 曾謂：「誰控制了印度洋，誰即能統治亞洲。印度洋為七海之鑰，二十一世紀世界的命運亦將決定於該海洋」^①。近十餘年來，印度洋及其鄰近區域發生了一連串的重大事件，要者如一九七三—七四年的阿拉伯產油國家石油禁運、「非洲之角」爭端、蘇聯侵犯阿富汗事件、伊朗回教革命、以及兩伊戰爭等，均曾一再引起國際視聽的普遍關注。加以，印度洋區域在國際政治、經濟及軍事戰略上的重要性，致使印度洋極可能繼大西洋及太平洋之後，成為當前國際政治權力爭奪的最新舞臺與美、蘇海洋強權角逐雄長之地。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國際組織與區域合作組織的日趨重要，以及東、西方的冷戰對抗，致使第三世界小國在國際關係中已愈來愈具有影響力。東起澳洲與印尼，北沿東南亞、南亞、波斯灣，以迄東非洲及南非的此一印度洋沿岸區域，約聚集有十五億以上的人口，佔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而該地區所屬國家更佔聯合國會員國總數的四分之一，且絕大部份為第三世界的開發中國家^②。因此，在當前國際政治活動中心已有逐漸轉向印度洋區域的趨勢下，印度洋國家的政治重要性實已日益顯著；而且迄至目前為止，尚無任何強權國家能完全掌握該區域情勢之發展。是以在蘇聯全球性擴張政策下，印度洋區域自為蘇聯所

註① Alvin J. Cottrell & R. M. Burrell (ed.), *The Indian Ocean: It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Importan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p. 76.

註② 參閱 Seymour Weiss, "U. S. Interests and Activities in the Indian Ocean Area,"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April 8, 1974, p. 373.; Ferenc A. Vaki, *Politics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s: The Balance of Power*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76) pp. 247-262.

覬覦而亟圖染指。蘇聯在印度洋擴張海軍實力的終極政治目標，即在削弱或排除美國或其他強權在印度洋區域的政治影響力，建立以蘇聯為首的集團勢力，並進而改變全球的權力基本結構。

就經濟意義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還，國際上普遍盛行的戰略觀念為，國家安危或經濟成長係取決於戰略物資的控制。因此，強權國家非但必須有效地發掘海外戰略資源與維護戰略資源運輸航線的暢通無阻，更必須竭盡所能地阻撓敵對國家控制此等戰略資源。蘇聯「和平共存」政策的基本特徵之一，即為兩種不同體制間的經濟競爭，為決定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鬭爭最後勝利的手段^③。蘇聯海軍總司令高希柯夫(S. G. Gorshkov)亦曾明確的表示：「蘇聯海軍的直接敵人為美國海軍，而目前的實際目標則為控制坐落於兩超級強權間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豐富資源」^④。他同時表示：「……以海軍攻擊敵人的海上交通線，並保護我們自己的海運航線，為蘇聯海軍遂行摧毀敵人軍事與經濟潛力目標的最重要任務之一」^⑤。印度洋區域雖然普遍經濟落後，但是由於其戰略資源，特別是石油的蘊藏量與產量，均甚為豐盛，以及該地區正位處世界主要航運線的要衝，故已成爲美、蘇海洋強權競爭的場所，尤以蘇聯更是虎視眈眈。

再就軍事戰略價值言，印度洋西臨阿拉伯半島與非洲大陸，北連南亞次大陸，東接澳洲、印尼巽他羣島(the Sunda Islands of Indonesia)與馬來半島，南界南極洲，爲世界第三大洋，其間不乏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海灣與島嶼。東出太平洋的麻六甲海峽，西進地中海的紅海與蘇彝士運河，出入大西洋的好望角，以及澳洲南方，爲印度洋的四個主要門戶。因此，印度洋實居於銜接歐洲和亞洲、非洲和大洋洲等航線的樞紐，其戰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而且由於印度洋具有能同時直接威脅蘇聯與中共的理想戰略位置，因此，蘇聯必須在印度洋(特別是在西北部的阿拉伯海)部署一支強大的海軍實力，一方面既可遏制美國核子飛彈潛艇對蘇聯本土的攻擊威脅；另一方面復可對中共構成腹背受敵的威脅。

基於上述的理解，印度洋目前實已成爲美、蘇強權海洋戰略所必爭的關鍵性海洋，其對強權均勢的改變更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作用。蘇聯自然不會輕易放過它在該戰略性水域擴張海軍實力的機會。因此，高希柯夫即曾坦率表示，在較長遠的打算中，蘇聯的目標是要對所有具有戰略重要性的海域，均有能力加以確實掌握^⑥。爲了實現此一長程戰略目標，蘇聯乃積極利用艦隊的友好

註③ Roger E. Kanet, "Soviet Attitude toward Developing Nations since Stalin," in Roger E. Kanet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Developing Nation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0.

註④ Dirk Hennings & Alexandra Herrmann, "Navy Doctrine in Soviet Union," *Translations on USSR Military Affairs*, No. 1295, Aug. 24, 1977, p. 18.

註⑤ S. G.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Survival*, Vol. XIX, No. 1, Jan./Feb. 1977, p. 29.

註⑥ 錢懷源、黃志潔合譯(S. G. Gorshkov 原著)·〔蘇俄海軍的崛起〕(Red Star Rising at Sea)·(臺北：黎明書局，民國六十四年九月)，頁11。

訪問、戰略基地的尋求與建立、以及艦隊的長期駐泊等策略，以擴張它在印度洋的海軍實力。

海軍艦隊的外交性角色

爭取與國向為國際社會中一種常見的現象。當今國際政治舞臺上的權力鬭爭，已不再僅僅是爭取軍事與政治優勢的鬭爭，同時也是爭取人心的鬭爭。大抵說來，當敵對雙方於遂行權力爭奪時，它們可以有三種策略選擇，即：(一)積極增強自己的權力；(二)使第三者的權力與自己既有的權力相結合；或者是(三)阻止第三者的權力附加於敵對者的權力之上^⑥。當它們選擇第一條途徑時，即係從事軍備競賽，當選擇第二和第三條途徑時，則屬於爭取友邦或盟國的政策。

軍事武力為一個國家權力明顯的表現，因此，一國在爭取與國時，經常亦採取武力展示的手段；蓋以武力的顯示將使其他國家對於該國的權力獲得深刻的印象。如一國缺乏武力，則其國內與國際聲望均將低落；如其軍事武力強大，則國內、外對其政策的支持程度大體亦將隨之增強。此外，軍事武力的展示，更經常成為強國威脅弱小國家，以達成其政治目標，進而提高其國家威望之手段。

海洋面積佔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二，且絕大多數的國家均係濱臨海洋，因此，海洋強權國家經常於適當時機，利用其强大海軍實力以影響國際事務的演變發展，進而達成某種國家利益。於是强大的海軍實為承平時期執行國家外交政策及影響他國行爲的一種頗具彈性且有效的工具。海軍艦艇之特點，為能自由活動於浩瀚無際的海洋中，將一國的國旗和武力，帶至世界海洋的任何角落。更由於海軍所具有的高度機動性與彈性，使它能很快地出現在各國的近海，執行它所負的任務。此外，海軍更具有「可見性」(visibility)，外型龐大壯觀的海軍艦艇，活動於公海或外國港口時，即能產生提高威望或保障安全的效果^⑦。高希柯夫即主張利用海軍在平時對友邦或敵國的人民顯示威力，使他們能夠見到蘇聯强大的軍事裝備和海軍艦艇的精良，藉以充分代表蘇聯雄厚的經濟與技術力量。他曾明白表示：「由於海軍作戰艦艇的高度機動力和耐力，所以海軍具有發揚國威的能力。它可以在承平時期到國外生動地顯示出一個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威力」^⑧。因此，海軍艦隊對外國港口的訪問，遂成為蘇聯爭取印度洋沿岸第三世界國家友誼，並藉此擴張政治影響力的一種手段。

註⑥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73), p. 181.

註⑦ Hedley Bull, "Sea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Power at Sea I: The New Environment*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1976), p. 6.

註⑧ 錢懷源、黃志潔合譯，前引書，頁一五七。

蘇聯對印度洋沿岸國家從事「炫耀實力」的海軍艦隊訪問，在一九六六年時僅有一次，至一九六九年時則增至五十四次^②。一九六六年一月，蘇聯帕拉曼尼號 (Plamenny) 驅逐艦首度訪問了衣索匹亞的馬薩瓦 (Massawa) 港口^③。一九六八年一月英國決定撤出蘇彝士運河以東防務後，同年二月蘇聯海軍總司令高希柯夫即訪問了印度，三月底蘇聯又派遣以一艘巡洋艦、一艘導向飛彈戰艦及一艘導向飛彈驅逐艦為主組成的小型特遣艦隊，由海參崴南駛，訪問印度的馬德拉斯 (Madras) 與孟買 (Bombay)。該艦隊除蘇聯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所搭乘的克魯普尼 (Krupnyy) 級驅逐艦於訪問印度後即直返海參崴外，其餘兩艦則繼續訪問了巴基斯坦的喀拉蚩 (Karachi)、斯里蘭卡的可倫坡 (Colombo)、伊拉克的巴斯拉 (Basra) 與翁姆科色 (Umm Qasr)、伊朗的邦達阿巴斯 (Bandar Abbas)、南葉門的亞丁 (Aden)、以及索馬利亞的摩加迪休 (Mogadishu) 等港口，迨至是年七月初方駛返海參崴^④。此後，蘇聯海軍船隻即經常友好訪問了印度洋沿岸各國的港口，其行跡曾遍及新加坡、吉大港 (Chittagong)、馬德拉斯、維沙卡巴南 (Vishakapatnam)、孟買、可倫坡、喀拉蚩、邦達阿巴斯、翁姆科色、亞丁、荷臺達 (Hodeida)、馬薩瓦、柏柏拉 (Berbera)、摩加迪休、基斯馬玉 (Kismayu)、蒙巴薩 (Mombasa)、三蘭港 (Dar-es-Salaam)、桑吉巴 (Zanzibar)、模里西斯 (Mauritius)、以及塞普爾羣島 (Seychelles) 等地。據西方觀察家的瞭解，蘇聯海軍艦艇的積極訪問印度洋，業已說明了一件事實，即欲藉對沿岸國家的友好訪問，爭取友誼，並使蘇聯海軍人員能熟悉印度洋地區的情勢，進而謀求取得沿岸港口基地設施的使用權，以為日後極可能導發的美、蘇印度洋海權爭霸戰預作準備。

根據一九七七年四月「澳洲展望」(Australian Outlook) 雜誌的統計資料顯示，由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間，蘇聯海軍艦艇訪問印度洋沿岸港口共計八十二次，美國則為六百二十五次。隨後由於蘇聯積極展開對印度洋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拉攏，因此，僅在一九七三年這一年內，蘇聯艦艇訪問印度洋各港口的次數已增至一百次，其中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以索馬利亞、伊拉克及亞丁為訪問對象；而在同一時期，美國海軍訪問印度洋沿岸港口的次數亦僅二百次左右^⑤。又據統計，從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五年中期，蘇聯海軍艦艇先後訪問了衣索匹亞的港口八次，蒙巴薩港十二次，蘇丹港十四次，伊拉克的港口二十次，印度的港口超過三十次，亞丁港五十次，而索馬利亞的港口更高達六十次以上^⑥。索馬利亞的港口及亞丁港之成為蘇聯海軍主要的訪問對象

註② Michael T. Klare, "Superpower Rivalry at Sea," *Foreign Policy*, No. 21, Winter 1975-76, p. 163.

註③ Geoffrey Jukes, *The Indian Ocean in Soviet Naval Policy* (London: IISS, *Aldephi Papers*, No. 87, May 1972), p. 25.

註④ *Ibid.*, pp. 12, 25; Alvin J. Cottrell & R. M. Burrell, "Soviet-U. S. Naval Competi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Orbis*, Vol. 18, No. 4, Winter 1975, pp. 1111-1112.

註⑤ D. O. Verrall, "Soviet Naval Activity," *Australian Outlook*, Vol. 31, No. 1, April 1977, p. 210.

註⑥ Dennis Chaplin, "Somali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Activity in the Indian Ocean," *Military Review*, Vol. LV, No. 7, July 1975, p. 3.

，正也顯示出，蘇聯欲將亞丁港與柏柏拉港建設成其主要海軍前進據點的用心。只不過，至一九七七年時，由於蘇聯在「非洲之角」爭端中，支持衣索匹亞，迫使索馬利亞轉而傾向美國，終令蘇聯野心受挫。

爲了使炫耀實力的艦隊港口訪問，更能直接影響被訪問國人民的情感與思想，以促進本國外交政策目標的實現，蘇聯友好訪問艦隊在出發前均會經過周詳的策劃，並透過報紙與外語廣播廣爲宣傳。這些船隻於駛抵外國港口後，立即展開一系列的活動，如與該國軍、政首長相互拜會、舉辦各種文化展示與樂隊演奏會、以及船上官兵的旅遊、歡宴等。一般來說，這些活動幾乎全由蘇聯派駐該國的使領館負責籌劃，海軍官兵則受到嚴密的監視，甚少有私人活動的自由。畢竟，對蘇聯來說，艦隊友好訪問的真正目的並非爲海軍官兵提供休憩與娛樂的機會，而祇是爲了國家政治目標的實現。此正如高希柯夫所言：「蘇聯海軍官兵稱得上是蘇聯人民的海外代表，他們對蘇聯及其人道主義理想所獲得的同情與友誼，貢獻良多」^⑤。蘇聯海軍經常派遣艦隊至印度洋各國港口訪問，即係對這些開發中國家進行心理戰，一方面假藉支援「民族解放」運動，以爭取這些國家的友誼；另一方面則以強大的海軍艦隊來威嚇這些弱小國家，使之服從蘇聯的領導。蘇聯此種將海軍實力運用於外交政策上的策略，對印度洋沿岸第三世界國家的爭取，確已獲得相當實效。前印度海軍參謀長查特吉(Admiral A. K. Chatterji)曾經表示：「蘇聯正以傳統的方式，利用它的海軍實力對印度洋沿岸國家施加軍事、政治與經濟壓力」^⑥。同樣，美國「海軍分析中心」(the Centre for Naval Analyses)的研究員凱利(Anne M. Kelly)亦認爲，蘇聯海軍艦隊之遠赴各國港口訪問，實際上乃是受到軍事戰略與政治外交上的動機所驅使。她說：「在蘇聯爭奪對第三世界的影響力過程中，海軍艦隊的訪問外國港口，似乎扮演了一重要的角色。此種活動更重要的目標是改善蘇聯在此脆弱地區之權力平衡中所處的劣勢。此外，蘇聯亦尋求更迫切與實際的報償，即海軍支援設施的獲得。此種設施能够加強對抗美國在第三世界海軍設施的戰力，並能支援蘇聯的區域戰爭(包括「民族解放」)戰略。研究蘇聯海軍的港口訪問，絕不能忽視蘇聯對第三世界廣泛情勢的介入。相反的，根據蘇聯海軍港口訪問活動的紀錄，顯示蘇聯愈來愈希望利用海軍以支持其政策目標」^⑦。

爭取沿岸基地的設立

海軍艦隊活動的基礎係建立在安全鞏固的海軍基地之上。爲了要形成強大的海軍實力，艦隊就必須要有一個海軍的戰略地理

註⑤ Bradford Dismukes & James M. McConnell (eds.), *Soviet Naval Diplomac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9), p. 101.

註⑥ B. Vivekanandan, "The Indian Ocean as a Zone of Peac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sian Survey*, Vol. XXI, No. 12, Dec. 1981, p. 1240.

註⑦ Alvin J. Cottrell, "The Maritime Challenge," *To the Point International*, Vol. 4, No. 11, May 16, 1977, p. 38.

位置，亦即要在從事爭奪的海域中，擁有一個沿岸海軍基地或一段地帶（可能是一個島嶼），其上至少要有一個港口作為取得、執行或確保制海權的根據地¹⁸。馬漢即曾表示：「對於力能制海的海軍，海本身等於一座橋樑、一條公路，它供給交通線上的優勢，但要使其有效，就必須獲得許多設防的基地」¹⁹。海軍基地之重要性在馬漢時代如是，在最近的英、阿福克蘭羣島戰役中亦復如是。

大體上，海軍基地的平時功能，是提供補給、修護、以及海軍官兵娛樂休憩的場所；在戰時，基地則為海、空軍重要的支援據點。一個國家如想在遠離本土的海域遂行戰爭或作長期的駐泊，則更需要在該海域附近擁有優勢的前進戰略基地，藉使海軍艦艇獲得最短的航程，並能和陸、空力量相配合，以發揮統合戰力之功效。

鑑於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期間，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慘遭殲滅的教訓，高希柯夫於一九五六年就任蘇聯海軍總司令後，除積極加強海軍實力外，更努力尋求在海外建立戰略海軍基地。在其所著「國家海權」(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一書中，即曾強調：「由於我們國家欠缺海軍艦隊所必須依賴的海外領土與基地，使得我們要建立一支遠洋艦隊以遏阻潛在侵略者（按指美國而言）來自海上的攻擊益形困難」²⁰。美國海軍戰略家海利克(Robert Waring, Herrick)亦曾表示，由於蘇聯海軍部署分佈甚廣，因此它必須獲得海上制空權並在新的活動範圍附近取得良好的永久性基地²¹。目前，儘管蘇聯在海上作戰艦艇的數量方面超乎美國之上，但是其噸位、火力及續航力依然遜於美國；更由於它的艦隊缺乏足夠的「海上補給」(underway replenishment)船隻，致無法在海洋上從事持久的活動。因此，如果蘇聯在海外未能擁有海軍戰略基地，以提供必要的加油、補給與修護，則其欲在距離本土遙遠的海域長期部署海軍艦隊，勢將遭遇重重困難。

除了缺乏沿岸海軍基地外，空中掩護能力的薄弱，亦為蘇聯在印度洋擴張海軍實力的另一缺陷。蘇聯由於缺乏攻擊性的航空母艦，因此其船艦易暴露於美國航艦艦載飛機的攻擊威脅下。如果蘇聯欲與美國在印度洋一爭雄長，則除了發展一支強大的海軍艦隊外，更必須在印度洋區域取得海、空軍基地設施的使用權。是以，只要印度洋中的任何島嶼或沿岸領土，如具有優勢的戰略位置，能供船艦停泊與飛機起降之用，並發展為作戰支援基地，則蘇聯必定會設法透過貿易、援助、締結友好合作條約等方式，

註¹⁸ Edward Wegener, *The Soviet Naval Offensive* (German by Henning Wegener)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5), p. 2.

註¹⁹ 楊鎮甲譯(A. T. Mahan 原著)，《海軍戰略論(下)》(臺北：中華文化出版社，民國四十六年八月一版)，頁八九。有關海軍基地之重要性，尚請參閱

Bernard Brodie, *A Guide to Naval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pp. 195-205; Anthony E. Sokol, *Seapower in the Nuclear Age* (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1), pp. 161-178.

註²⁰ S. G.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9), pp. 179-180.

註²¹ *Time*, Jan. 31, 1972, p. 11.

積極爭取基地設施的使用權。海軍戰略家摩爾(John More)在其所著「蘇聯海軍現況」(The Soviet Naval Today)一書中即曾表示，目前蘇聯積極尋求獲得一連串之海軍基地，實與昔日英國海軍尋求船隻之加煤站並無二致，其作用主要還是寄望於未來^②。

儘管蘇聯當局一再表示它在印度洋並未擁有任何基地，但是根據種種資料顯示，自一九六八年蘇聯海軍進入印度洋以來，蘇聯確在極力設法取得沿岸海軍基地設施的使用權，甚而協助沿岸國家建立海軍基地。目前，蘇聯在印度洋雖然尚未正式擁有或完全控制任何一處「永久性基地」，但確曾廣泛地取得了使用基地之補給、修護等設施的權利，諸如新加坡、孟買、柯慶(Cochin)、維沙卡巴南、安達曼(Andaman)、尼可巴(Nicobar)羣島、亞丁、摩加迪休、柏柏拉、基斯馬玉、模里西斯、翁姆科色、荷台達、索科德拉(Socotra)及吉大港等^③。印度雖然與蘇聯關係密切，但基於其不結盟的中立政策，故始終拒絕對蘇聯提供長久性的軍事設施。因此，雖然蘇聯海軍使用印度的維沙卡巴南等港口甚為頻繁，却無充分實據證明蘇聯有永久使用印度海軍基地之契約存在。一九六八年英國撤離亞丁保護地後，蘇聯即刻派遣專家接管南葉門的亞丁與姆卡拉(Mukalla)港口。一九七二年蘇、埃關係惡化後，蘇聯即積極拉攏索馬利亞，不久索國的柏柏拉港即成為蘇聯海外最大基地。同年，在其與伊拉克所簽訂的友好合作條約中，蘇聯又獲得了巴斯拉與翁姆科色兩港口設施的使用權^④。

大抵言之，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蘇聯與索馬利亞關係惡化之前，蘇聯在印度洋建設海軍戰略基地的計劃，是以柏柏拉基地為重心。因為該港在地理位置上與隔岸的亞丁灣共同扼制着亞丁港及紅海南方的出入口，為地中海與印度洋間一處極為重要的戰略地帶，亦為印度洋、波斯灣石油航線的要衝；此外，印度洋西北隅更為蘇聯嚇阻美國飛彈潛艇攻擊威脅的戰略位置。基於索馬利亞的重要地位，蘇聯乃欲將柏柏拉建設成一座完整的戰略基地。根據一九七五年美國國防部報告及國會實地考察的結果，發現彼時蘇聯在柏柏拉的主要基地建設，有一座深水港、兩條可供巨型運輸機起降的一萬五千呎長的跑道、一座能貯存十四萬桶燃料的油庫、一座能直接連繫莫斯科與海上船隻或潛艇的高頻率通訊中心。該基地並會儲藏SSN-13與SSN-12型飛彈和艦對艦的冥河飛彈^⑤。這些設施除了能支援與補給蘇聯在印度洋活動的艦艇外，更將威脅到西方國家的石油運輸航線。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蘇、索關係惡化，索馬利亞關閉了所有蘇聯在其境內的海、空軍設施。為了彌補它在柏柏拉基地的損失

註② David Buchan, "Red Flag over Ocean of the Worl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 24, 1976, p. 2.

註③ Antoine Merlino, "Big Power Games in a Zone of Peace," *Hongkong Standard*, Mar. 28, 1975, p. 9.; Igor A. Lebedev, "Soviet Policy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Indian Ocean," *Australian Outlook*, Vol. 31, No. 1, April 1977, p. 137; A. T. Cottrell & R. M. Burrell, "Soviet-U. S. Naval Competi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pp. 1116, 1122.

註④ David Rees, "Soviet Strategic Penetration in Africa," *Conflict Studies*, No. 77, Nov. 1976, p. 3.

註⑤ Lawrence I. Whetten (ed.), *The Future of Soviet Military Power* (London: Macdonald & James's Publishers Limited, 1976), p. 112; "Soviet Foothold in Somalia," *Intelligence Digest*, No. 445, Nov. 1, 1975, p. 3.

，蘇聯乃轉而積極拉攏南葉門，將撤自柏柏拉的一些軍事設施運抵亞丁港。目前，蘇聯除了取得使用亞丁的海、空軍基地的權利以供加油、修護與補給外，並協助擴建亞丁海軍基地的潛艇停泊處。南葉門外海的索科德拉島也已成爲蘇聯在印度洋的主要海軍基地。該島除擁有巨型的浮動船塢外，並建有一座電子情報站與一座通訊中心。據西方情報消息來源顯示，蘇聯亦正在紅海中衣索匹亞所有的德拉克羣島（the Dahlak Archipelago）與丕林島（Perim Is.），建立各種基地設施，其中德拉克羣島的建設類似昔日在柏柏拉所擁有的潛艇停泊處與飛彈儲藏所等。除了這些基地設施外，蘇聯更在塞昔爾羣島、模里西斯、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以及東非沿岸建立有永久性的繫船浮筒（mooring buoys），以供船隻補給與修理之用²⁶。茲就蘇聯在印度洋的海軍基地設施，繪後圖說明之：

依據西德海軍戰略家威格納（Edward Wegener）的看法，由於長期的積極爭取，蘇聯在印度洋的北部（包括紅海和波斯灣）已經擁有一系列完整的「海事位置」（maritime position），並能對沿岸國家造成心理上與政治上的影響力。今後如果蘇聯能突破進入印度洋的障礙（即克服出入達達尼爾海峽的限制以及西方海權對東地中海與蘇彝士運河的控制），則它在印度洋的「海事位置」就能進一步轉變爲「戰略位置」（strategic position）²⁷。如此，蘇聯的海軍實力就將控制阿拉伯半島、進而控制南亞次大陸，並有限度地掌握印度洋的制海權。

蘇聯海軍實力在印度洋的擴張，以及沿岸海軍基地設施使用權的獲得，至目前爲止，仍然寄託在沿岸國家友好關係的基礎之上。雖則這些與蘇聯友好的國家在表面上傾向蘇聯，但它們仍有它們自己的看法，一旦其內政或外交政策改弦易轍，便隨時有擺脫蘇聯籠絡或控制的可能，此實爲蘇聯海洋戰略的嚴重缺陷。

海軍艦隊的長期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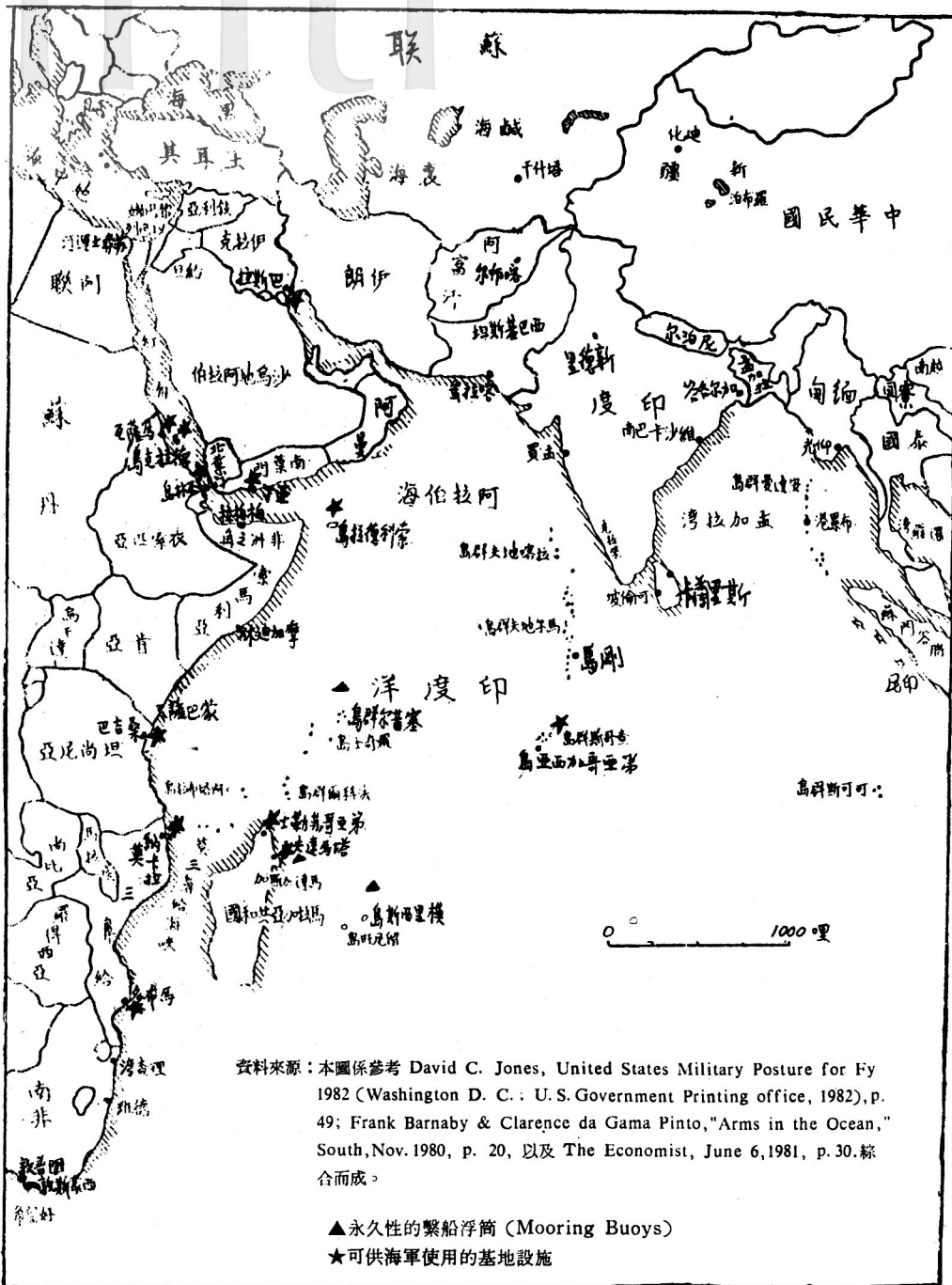
海軍艦隊長期駐泊於具有戰略重要性的海洋，在平時除了可以向潛在敵人展示威力，以示隨時準備作戰外，復可在沿岸區域

註²⁶ 有關蘇聯在印度洋的海軍基地建設，請參閱，Michael T. Kaufman, "U. S. in Indian Ocean—a sudden increase in naval power," *Asahi Evening News*, April 28, 1981, p. 5; "The Gulf Survey," *The Economist*, June 6, 1981, p. 5; Frank Barnaby & Clarence da Gama Pinto, "Arms in the Ocean," *South*, Nov. 1980, p. 20; Drew Middleton, "Russia Seen Firmly Based in S. Yeme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2, 1978, p. 5.

註²⁷ Edward Wegener, *op. cit.*, pp. 90-93. 威格納認爲，海軍「戰略位置」所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爲，它能和本國的力量源泉及補給供應保持連繫，而此種連繫必須在戰時亦能安全無虞。「海事位置」則不須具備此種特別條件，它只是平時能爲海上部隊提供服務即可。

(年〇八九一) 施設地基的利用供可洋度印在軍海聯蘇

蘇聯在印度洋的海軍實力政策



發生緊急情況時，迅速地將駐泊於該區域附近的艦艇集結在有關國家的外海，對之施以政治威脅或表示支持。在戰時，則由於艦隊的長期駐泊而能保持機動性，以適時應付突發事件。因此，如何維持一支具有相當實力的艦隊長期駐泊於爭霸中的海域，對於參與角逐的列強而言，無論在平時或戰時，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蘇聯將其海軍艦隊長期部署於海外水域約始於一九六〇年，其後歷經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中的屈辱，以及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以、埃戰爭，更令蘇聯積極欲在距離本土遙遠的海域部署實力強大的艦隊。高希柯夫即曾表示：「蘇聯帶有斧頭和鐮刀的國旗，現正驕傲地在世界各大海洋上飄揚，預測在不久的將來，美國將發覺它將不再擁有海上霸權的地位」^②。此一論調似已在蘇聯一九七〇年四、五月間所舉行的「海洋一號」(Okean I)及一九七五年四月所舉行的「海洋二號」(Okean II)演習中，獲得了驗證。尤其在「海洋二號」演習中，蘇聯一共動用了水面艦艇超過兩百艘、潛艇一百艘，以及至少數十架的海軍偵察機，並有龐大的商船隊配合演習。演習範圍更廣及北海、挪威海、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亞丁灣及日本海一帶。蘇聯的積極擴張遠洋海軍，並極力尋求在重要海域維持艦隊的長期駐泊，業已對美國海洋實力構成很大的威脅。就此美國前海軍軍令部長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朱瓦特上將 (Admiral Zumwalt) 即曾精闢地指出，高希柯夫的蘇聯海軍戰略思想為，在戰時擊潰西方國家的海軍部隊；而平時海軍駐泊於海外的使命則有三項：(一)為了遏制美國駐外海軍武力所產生的影響力，蘇聯海軍部隊必須形成一種態勢，對美國的先發制人能力加以「中和」；(二)為了實現其世界「超級強權」的意願，蘇聯必須在重要水域維持於必要時，運用其軍事力量的能力；(三)要在對蘇聯特別重要的海域施加壓力，藉以支持其政治目標^③。

由於高希柯夫的積極爭取與努力，遂使蘇聯海軍於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已由沿海防禦性的海軍擴展為遠洋攻擊性的海軍，節節向世界各大海洋推進。當前印度洋的情勢發展，更迫使蘇聯需要在此水域維持一支強大的海軍常備武力。蓋以蘇彝士運河的關閉、西方海軍武器系統的精進、美國海軍在印度洋所構成的潛在威脅、以及蘇聯與中共的衝突等因素，均迫使蘇聯不得不作如是打算。

蘇聯在印度洋有長期海軍駐泊，係緊接一九六七年蘇彝士運河關閉之後。運河的關閉顯示出蘇聯海軍在印度洋的實力擴張有了嚴重的缺陷。蘇聯當局已很清楚地了解，若在印度洋無法長期駐泊一支具有戰略機動性與自給自足能力的強大海軍，則蘇聯海軍在印度洋的作戰能力是相當有限的。因為，蘇彝士運河的關閉，必將迫使蘇聯海軍航行一段相當長的距離，才能抵達印度洋，而在途中尚須通過一些由他國所控制的咽喉地帶；更何況蘇聯海軍缺乏現代化的補給與支援船隻，其海上補給技術已屬落伍。

一般來說，蘇聯欲在印度洋經常維持一支實力強大之海軍艦隊的駐泊，顯然是基於下述三種主要軍事戰略目標的考慮，即：

註② "The Russia's Navy: A New Challenge at Sea," *Time*, Feb. 23, 1968, p. 17.

註③ 錢懷源，黃志潔合譯，前引書，頁二一三。

(一)尋求南疆領土的安全，遏阻可能來自美國由海上發動的攻擊威脅；(二)維護蘇聯東、西領土間海洋交通的通暢，並對西方國家實施海洋阻絕；(三)包圍中共側翼，遏制中共在印度洋勢力的擴張^⑧。

印度洋的東、西、北三面均屬陸地，唯有南面是開闊的海洋，形成一個大弧形地帶。蘇聯的戰略構想即希望利用強大海軍對此一弧形地帶的國家發揮影響與控制力，並藉此屏障蘇聯南疆領土的安全。美國如在印度洋西北角部署北極星(Polaris)或海神(Posidon)等核子飛彈潛艇，則將可威脅到蘇聯本土的安全。是以，蘇聯必須在印度洋長期駐泊強大海軍，以提高它的戰略防禦能力。「莫斯科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Moscow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一位學者即曾指出，蘇聯政府有感於一九七〇年代以來美國潛艇即積極活動於印度北部，因此，自蘇聯海軍進駐印度洋後，就始終在該水域維持一個相當的反潛作戰能力^⑨。

印度洋不僅為西方國家石油輸入的主要航線所必經，且為蘇聯東、西間交通運輸的主要孔道。頗具官方性質的蘇聯「新時代」(New Times)雜誌即曾表示，「對我們國家來說，印度洋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是一條最便捷且終年暢通無阻的海道，藉此，蘇聯遠東各港口得與黑海各港口取得聯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戰略家們，藉口必須保護由波斯灣經好望角到西歐的海運安全，業已對西印度洋虎視眈眈」^⑩。假使蘇聯能在印度洋維持一支能獨立作戰的海軍艦隊，則於平時除可以確保東、西航線的暢通外；於戰時非但可以發揮結合其太平洋艦隊與黑海艦隊的效能，打通通往公海的途徑，更可進一步有效地阻絕西方國家的海上交通。

由於蘇聯與中共彼此衝突的日益加甚，以及自一九六〇年代早期以來，中共核子武器發展的結果，致使蘇聯近幾年來為了遏制中共的對外擴張，乃一方面在中國大陸北方加強部署陸上發射的洲際飛彈和反彈道飛彈，另一方面則欲自海上威脅中共。印度洋對蘇聯的「圍堵中共」策略，實際上提供了兩項重要的戰略價值，即：(一)蘇聯如在印度洋部署核子攻擊武器，將使莫斯科在攻擊中國大陸時具有更大的彈性；(二)蘇聯希望使南亞與東南亞國家對中共的立場能與蘇聯相一致，藉以在中共南翼阻止其勢力的伸張^⑪。就蘇聯來說，印度洋較地中海更接近中共的核子基地與火箭發射場，且中國大陸西北均在由印度洋水面或水下發射之中程飛彈的射程範圍內。為了有效圍堵中共，蘇聯自須在該海域長期駐泊海軍艦隊。

註⑧ Alvin J. Cottrell & R. M. Burrell (ed.) *The Indian Ocean: It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Importance*, p. 334.

註⑨ William F. Hickman, "Soviet Naval Policy in the Indian Ocean,"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 105/8/918, Aug. 1979, p. 44. 譬如，在一九七四—七五年間，幾乎每個月約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蘇聯在印度洋船隻，配備有反潛作戰能力。

註⑩ Alexei Sergeyev, "Indian Ocean—Tension Area or Peace Zone?" *New Times*, No. 51, Dec. 1976, p. 23.

註⑪ 穆恩·巴哈尼·森古普塔, "The Soviet Union and South Asia," in Roger E. Kanet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Developing Nations*, p. 141; Dennis Chaplin, *op. cit.*, p. 9.

基於上述戰略利益的考慮，自從蘇聯海軍於一九六八年三月首次長期駐泊印度洋以來，其艦艇即頻頻活動於印度洋，特別是阿拉伯海水域。在一九七一年以前，蘇聯在印度洋通常約有十到二十艘的船隻，其主力一般為：一艘巡洋艦、兩艘驅逐艦、一艘潛水艇及各種補助船隻；大體上，每年的五月到七月以及十二月到翌年一月為輪調時間，故駐泊在印度洋的船隻較平常為多。在印度洋地區有突發事變時，則其派駐印度洋的船隻亦急劇增加。例如，一九七一年印、巴戰爭時，蘇聯在印度洋的艦艇達二十艘；一九七三年以、阿戰爭時，其在印度洋更集結有三十艘以上的艦艇，而在地中海更高達九十五艘^④。據統計，在一九八〇年時，蘇聯海軍在印度洋的活動次數較之前一年（一九七九）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很顯然地係由於阿富汗危機與兩伊戰爭之故。迨至一九八一年初，蘇聯在印度洋的艦艇多達三十四到三十六艘，此為其在該海域駐泊船隻最多的時候，其中包括六艘潛艇（多數為核子動力，並配備有導向飛彈）、三或四艘克里瓦克級（Krivak Class）導向飛彈巡防艦、一或兩艘科特林（Kotline）導向飛彈驅逐艦、七艘克列斯塔級（Kresta Class）巡洋艦、數艘掃雷艇與兩棲登陸艇，以及十五到二十艘的加油、維護與補給的支援船隻，這些船隻屬於蘇聯太平洋艦隊中的第五作戰中隊（The Fifth Operational Squadron）。此外，太平洋艦隊屬下的明斯克（Minsk）號航空母艦與其支援艦有時亦進入印度洋^⑤。吾人若以船舶活動日（ship-day）為依據，則蘇聯海軍艦艇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六年在印度洋活動消長情形，可以用下表說明之。

一九六八—七六年蘇聯海軍艦艇在印度洋的船舶活動日表

年份	一九六八	一九六九	一九七〇	一九七一	一九七二	一九七三	一九七四	一九七五	一九七六	總計
船舶活動日	一、九二〇	四、〇六六	四、九三六	四、〇三三	六、四〇四	五、七四〇	七、九三三	七、一六八	七、三三五	四九、五二五
備註	一、船舶活動日即在某一海域內活動的船舶艘數與活動日數的乘積。（1 ship-day = 1 ship in area for one day） 二、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及一九七四年的數字並未包括蘇聯海軍在孟加拉與埃及的掃雷作業。									

資料來源：Bradford Dismukes & James M. McConnell (eds.), *Soviet Naval Diplomac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9), p. 92.

註④ Paul J. Murphy (ed.), *Naval Power in Soviet Policy*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p. 277.

註⑤ 參閱，Maharaj K. Chopra, "What Russia is doing in the Indian Ocean," *Press Comment*, April 30, 1981, p. 11; 「蘇聯印度洋艦隊實力隨時可增防與美匹敵」，《南洋商報》，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

海軍戰略家維拉爾 (D. O. Verrall) 曾對蘇聯在印度洋的海軍艦艇駐泊情形作一分析，顯示蘇聯在印度洋主要戰艦（如巡防艦及潛水艇）的駐泊，除了情勢緊張外，通常均低於蘇聯在該海域海軍艦艇總數的百分之五十。此外，除了在區域緊張時期（如一九七一年的印、巴戰爭與一九七三年十月的中東危機等），蘇聯曾駐泊現代化的基達 (Kynda) 型與克列斯塔級飛彈巡洋艦外，較陳舊的史瓦德羅夫級 (Sverdlov Class) 巡洋艦與科特林驅逐艦則仍為蘇聯在印度洋海軍部署的主力。迨至一九七五年初，蘇聯開始部署彼得亞 (Petya) 級巡防艦與卡寧 (Kanin) 級驅逐艦於印度洋，是年底復駐泊配備有新式海空飛彈及反潛作戰裝備的克里瓦克級巡防艦。就潛艇言，蘇聯在印度洋仍以駐泊柴油動力及使用魚雷的 F 級潛艇為主力，唯有發生緊急情勢時，方部署威力較大，配備有艦對艦飛彈的柴油或核子動力潛艇^{⑤6}。

近年來，由於中東地區情勢的詭譎多變，迫使美、蘇雙方為了確保自身利益，打擊對方的勢力，而一再強化它們在印度洋的海軍實力。為此，美國政府尚有成立一支永久性的「第五艦隊」之議。就蘇聯來說，雖然近幾年來，頻頻派遣海軍艦艇活動於印度洋；但它亦未曾在印度洋正式成立一支特遣艦隊。蘇聯駐泊在印度洋的海軍艦艇，都是臨時由黑海、波羅的海、特別是太平洋艦隊中抽調而來的。因此，一位蘇聯海軍將領曾將蘇聯在印度洋的此等海軍部隊稱為「蘇聯在印度洋的戰略艦隊」。然而，蘇聯欲在印度洋長期駐泊艦隊，首先則必須克服支援與補給的困難。這也就是何以蘇聯竭力爭取使用印度洋沿岸基地的權利，並在公海設置繫船浮筒，以供船舶停靠與補給的原因。

結語

原本為歐洲陸權國家的蘇聯，由於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不斷積極擴展海軍實力，目前業已成為足以在世界各海洋與美國等西方海權國家互爭雄長的世界海洋強權。它原屬沿海防禦性的海軍已發展成遠洋攻擊性的海軍，更成為蘇聯執行外交政策的一種重要工具。

為了配合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擴張政策，蘇聯勢須將其海洋戰略位置向前推移，建立起海外前進據點，以便與西方海軍實力相對抗。印度洋區域有異於太平洋與大西洋，目前仍屬權力真空地帶，客觀情勢有利於蘇聯從事海軍實力擴張；加以印度洋地區在國際政治、經濟與軍事價值的日益重要，故自然成為蘇聯爭奪世界海洋霸權的理想場所。

蘇聯海軍船隻在印度洋的長期駐泊，實與其國家利益息息相關。就純軍事觀點言，由於恐懼美國由海上發射之戰略武器系統的攻擊威脅，蘇聯海軍必須在印度洋水域維持「前進部署」(forward deployment)，以為有效的對抗，此外，蘇聯更欲藉此

註⑤ D. O. Verrall, *op. cit.*, p. 208.

對西方國家的船運實施有效的海上阻絕。就政治觀點言，蘇聯意圖使用其駐泊在印度洋水域的海軍艦艇，對沿岸國家發揮影響力，以實現其國家政治目標。

蘇聯海軍船隻經常遠赴印度洋沿岸各國港口作外交性的友好訪問，實際上亦為達成其海軍實力擴張目標的一種策略運用。蓋在政治上，艦隊的友好訪問可在政治上爭取這些國家的友誼，強化對它們的影響力，鞏固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勢力，以與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在軍事上，復可藉此友好關係的建立，尋求在沿岸建立起海軍戰略基地，或至少取得使用這些國家海軍基地設施的權利。

至於海軍戰略基地的建立，則為長期維持強大海軍實力部署的必要條件；而海軍戰略基地與強大海軍艦隊的相互結合，又為建立前進據點所不可或缺的要素。蘇聯如果沒有在印度洋沿岸建立海軍戰略基地或未取得沿岸國家海軍基地設施的使用權，則以其遙長的後勤補給線，必無法在印度洋長期維持一支實力雄厚的海軍艦隊。

事實上，上述三種蘇聯海軍實力擴張策略，是相輔相成，相互為用的。譬如，如果蘇聯僅僅派遣海軍艦隊至印度洋沿岸國家的港口進行友好訪問，而並未在該海域擁有海軍基地或經常維持艦隊的駐泊，則其所能發揮的影響力將是有限的。因此，自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蘇聯開始在印度洋駐泊海軍船隻起，其派遣艦隊訪問沿岸港口的次數也隨之日漸頻繁，而其尋求在沿岸建立海軍戰略基地或爭取基地設施使用權的態度亦愈趨積極。在周詳且有系統的擴張策略下，目前蘇聯在印度洋的海軍實力業已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構成某種程度的威脅。為了確保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在印度洋（特別是波斯灣）的利益，美國實應儘早促成其印度洋「第五艦隊」構想的實現。